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 建立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德坤 关培凤

内容提要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是反法西斯战争能够取胜的基石。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世界上最早倡导、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坚持抗战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多方寻求盟国,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以及公开倡导民主国家结盟合作等外交活动,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中国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地位和作用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是反法西斯战争能够取胜的基石。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展开全民族抗战的中国,在立足于自身抵抗的同时,积极寻求盟国共同抗日,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率先倡导与积极推动的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推动下,中国政府确立了寻求盟国,抗击日本的外交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贯彻结盟抗日的方针,中国不仅以坚持持久抗战的实际行动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开展争取国际支持的活动,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而且还率先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通过不懈的努力为联盟的最终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¹。

中国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思想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始酝酿的。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中国大肆侵略,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而且打破了列强在东亚的均势,激化了日本同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美、英、苏等国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掀起了关于未来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应取方针的热烈讨论。许多人认为,世界大战一旦发生,中国应与苏俄和英美等国结成联合阵线,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²。毫无疑问,萌芽于民间的这种结盟抗日主张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响应。在避战求和、攘外必先安内思想支配下的国民政府,更希望借助国联来求得中日问题的

¹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0子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 05JZD00010。

² 5 外交评论 1934 年第 3 卷,第 11、12 号合刊;5 东方杂志 第 31 卷第 3 期等。

解决。由于英法操纵的国联袒护日本,拒绝制裁侵略,¹ 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基本上没有取得实效。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签署后,国民政府更倾向于以妥协让步而不是结盟抗日来解决中日问题。

然而,国民政府的一再退让换来的却是日本对中国变本加厉的侵略。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国内抗日舆论不断高涨,还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5八一宣言⁶,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间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⁰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热烈支持。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鉴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势,¹中国不但应当和, ,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0°}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从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⁰开始,尤其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政府也日渐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中日之间的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战争,寻求盟国、结盟抗日的问题也随之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多次提出,¹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 ,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0”}7月29日,在政府召集的庐山谈话会上,著名哲学家吴康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及列国可能采取的态度,提出了/南联英美,北结苏俄⁰的外交方针,以对付日本侵略。此外,吴康还主张联络法国,中立德国和意大利,以巩固中国在国际上优胜的形势^¼。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确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5抗战建国纲领⁶,吸纳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提出的联合世界各国共同抗日的主张。该纲领对于战时外交方针明确规定,要/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0½}。至此,中国正式确立了联络盟国、结盟抗日的外交方针,并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首先,继续争取国联和九国公约组织的支持。七七事变爆发后,为表示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尊重,中国首先向国联申诉,呼吁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制裁。然而,不愿制裁日本的国联却将这个烫手山芋抛到了九国公约组织的篮子里,指望美国能出面处理中国的申诉。英国外长艾登直言,英国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将/与美国保持完全一致^{0¾},首相张伯伦则更坦率地说,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谈论经济制裁和武力是完全错误的,¹我们是在这里缔造和平,而不是扩大冲突^{0^¼}。美国深知英国的意图,便打定主意不充当制裁日本的领导者。英、美两国的态度如此,也就注定会议不会取得什么积极成果。事实上,中国对国联会议和布鲁塞尔会议都不抱多少希望。中国固然希望国际社会能果断制止侵略,但在深知制裁无望的情况下,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将国联和布鲁塞尔会议作为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争取

¹ 索恩:5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联与1931-1933年的远东危机6(Christopher G.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 - 1933*), 伦敦1972年版,第189、7页。

[°] 5毛泽东选集6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33页。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5毛泽东外交文选6,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¼ 蒋永敬:5抗战初期的外交与国联及德使之调停6,张玉法主编:5中国现代史论集6第9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365页。

^½ 彭明主编:5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6(1937-1945)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

^¾ 弗里德曼:5英中关系,1931-1939年6(I.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 - 1939*), 纽约1940年版,第104页。

[¿] 克利福德:5从中国撤退:1937-1941年的英国远东政策6(Nicholas R. Clifford, *Retreat from China, 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 - 1941*), 伦敦1967年版,第38页。

国际舆论同情的国际讲坛。正因为如此,中国派出以胡适为首的一批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赴欧美开展民间外交。这些学者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控诉日本的侵略暴行,唤起欧美人民对中国不畏强暴、奋起反抗的深切同情,为日后西方国家实行援华制日政策、并最终与中国结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其次,争取英美两国援华制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尽管英美两国深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超出中日两国冲突的范围,造成了世界性的危险¹,但出于不愿因援华而冒同日本冲突的危险这一自私考虑,英美都拒绝援助中国,对日本的侵略也不过是作些/温和的指责而已²。不过,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争取国际援助的努力。1938年上半年以前,中国政府主要寄希望于控制国联的英法两国;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把美国作为主要求助对象,在争取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日、寻求美国经济援助及制裁日本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推动了美国公众舆论的转变,也使美国迈出了援华制日的第一步。1938年6月,美国开始对日本实施/道义禁运³。同年12月,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即桐油贷款),/这是美国-援助受侵略国.原则的第一次运用⁴。在美国影响下,英国也宣布对华贷款50万英镑,随后又决定贷款500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法币的平准基金。此后,英美渐渐打开了对华援助的大门。欧美国家此时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和对日本的制裁虽然极其有限,但对中国而言,却代表了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和政治上的承诺。12月20日,5新华日报6就英美对华贷款发表社论,肯定/这两笔借款,是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的意义的⁵,这说明/英美两国对援助中国抗战和制裁日寇侵略,走到采取并决定了具体办法的路上⁶。中国通过争取英美经济援助的方式,加强了同这些国家的联系,为日后争取它们与中国合作,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进而打败日本起了铺垫作用。

再次,争取苏联物资援助和敦促苏联对日作战。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中国在争取苏联的援助方面是比较顺利的。七七事变爆发伊始,中国政府就派人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谈由苏联供应军事装备并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一事。由于苏联的坚持,中国放弃签订互助条约的主张,于1937年8月21日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由此敞开了援华的大门。仅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苏联就同中国签订了四次以货易货协定,共向中国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的物资⁷。对此,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说:/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⁸,苏联的援助是真正/可靠的援助⁹。孙科也公正地评论说:/外援方面,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以后,直到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以前,整整四年间,我们作战所需物资,大部分独赖苏联的援助。¹⁰为了使苏联能够更直接地援助中国抗日,从抗战爆发直到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政府还多次敦促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但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最终拒绝了中国人民的请求。尽管如此,苏联还是采取了一些不致引起苏日战争的军事介入行动,如苏联以志愿队的名义有组织地向中国派出空军作战人员,投入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慷慨的物资援助和军事支持对

¹ 克拉布:5美国外交政策学说:其意义、作用和未来6(Cecil V. Crabb, The Doctrin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ir Meaning, Role, and Future),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5页。

² 埃里克森:5同盟的缔造:蒋介石和美国外交政策,1936-1941年6(Brenda A. Ericson, The Making of an Ally: Chiang kaiShek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6-1941),新墨西哥大学2004年版,第12页。武汉大学图书馆光盘索引:美国大学博士论文文库。

³ 巴兹尔:5罗斯福:从慕尼黑到珍珠港6(Rauch Basil, Roosevelt: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纽约1950年版,第94页。

⁴ 陶文钊:5中美关系史1911-195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⁵ 奎格利:5远东战争,1937-1941年6(Harold S. Quigley, Far Eastern War, 1937-1941),韦斯特波特1973年版,第257页。

⁶ 5毛泽东选集6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19、563页。

⁷ 孙科:5我们惟一的路线6,转引自陶文钊等著:5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6,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4页。

孤军奋战的中国而言,真可谓雪中送炭。此时中苏虽没有结成同盟,但中苏两国间所建立的这种友好和亲密关系,无疑为日后的结盟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推动下,中国政府确立了寻求盟国,共同抗日的外交总方针,并为实施这一方针开展了初步的外交活动。由于当时英、美、法等国正忙于应付欧洲法西斯国家的扩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引起西方大国足够的重视,相反,它们宁愿通过妥协退让、牺牲中国来避免同日本直接对抗,以换取一时的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得到这些国家公开的政治支持和军事物资援助,无疑是困难重重。因此,中国把外交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争取国际社会的道义支持和经济援助上,以此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为结盟抗日目标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二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英美等国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根本无力抗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很快就会变成第二个埃塞俄比亚。¹ 出于日本占领中国后仍能维系其在华利益的考虑,英美等国都竭力避免得罪日本,对日本的侵华采取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等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对日本实施绥靖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对此,中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39年2月,日本占领海南岛以后,对外国在华利益、尤其是对英国在华利益一再肆意侵犯。6月14日,日本正式封锁天津英租界,造成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对英国利益直接损害的最严重事件²。然而,在远东实施绥靖政策的英国最终向日本妥协,与日本缔结了完全满足其要求的5有田) 克莱琪协定³,公开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和特殊需要。对于英国的妥协活动,中国早有警觉。随着欧洲形势的日益恶化,蒋介石非常担心英法为顾全欧洲而与日本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危害中国抗战。为此,蒋介石在1939年7月20日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表示对欧洲局势/焦虑不堪⁴,并吁请罗斯福对英法施加压力,/务使此等国家(英、法)不至与远东侵略国之日本成立任何谅解,使有损及中国之权益与九国公约之精神,并妨碍中国之继续抗战⁵”。7月24日英日协定公布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群起愤怒声讨。7月25日,延安5新中华报6发表社论,严正警告英国政府:/你们的妥协政策,只是自掘坟墓。,,你们愈是和日本妥协,你们在远东的一切利益将愈被排斥,将愈不可保。因此,要保持你们在远东的利益,维护远东的真正和平,只有坚决的抵抗日本,绝不是与日本作妥协投降,牺牲中国。0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强调自力更生,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⁶。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推动下,7月26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英方的态度表示失望。28日,蒋介石致电5伦敦新闻纪事报6,正告英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对日本/即使欲作暂时的让步,亦无异于以血肉喂猛虎。即使英国以百年来在华所有整个之权益,悉数让与日本,日本军阀亦断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动0。他还严正指出,中国不是捷克,中国为独立生存而自立奋斗,任何牺牲,在所

¹ 路易斯:5英国在远东的战略,1919- 1939年6(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 1939),牛津1971年版,第244页。

² 徐蓝:5英国与中日战争6,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³ 秦孝仪主编: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一),中国台北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85页。

⁴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5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 19496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1- 133页。

不辞,任何协定如不得中国政府之承诺,无论在法律上、在事实上均丝毫不能生效。是以抗战之决定因素,在于吾人不屈不挠之勇气,吾人必在任何困难下继续奋斗¹。

尽管英日妥协活动遭到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和抵制,但英国对日的绥靖还没有完全结束。1940年6月,日本再次向英国施压,要求其关闭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国际援华通道滇缅公路和关闭香港至中国大陆的关卡,并从上海撤出英国军队²。日本还在毗邻英国九龙租借地的边界上集结军队威吓英国。面对日本的高压,寻求美国支援未果的英国又一次向日本屈服了。7月17日,英日两国签署了关于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的协定。滇缅公路的关闭,切断了世界各国支援中国抗战物资的国际通道,违背了国联曾多次做出的不得削弱中国抵抗力量的决议,因而遭到了中国的坚决反对。早在6月28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就向英国外交部指出,滇缅公路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希望英国不要屈服于日本。中国政府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郭泰祺也专门电告胡适,希望他能敦请美国设法予以阻止³。7月18日,蒋介石还指示驻苏大使邵力子请求苏联就反对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作一有力表示⁴。英国正式通知中国关闭滇缅公路的决定后,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英国/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⁵,并指责英国此举无异于帮助中国之敌人,实已完全蔑视其以国联重要会员国资格所担负之义务,实已违反国际公法之原则⁶。声明还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不会屈服于外力而放弃抗战的决心⁷。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的声明给予了有力支持。7月25日,《群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决不会轻易屈服,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及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只要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中国就一定可以获得外援而不会孤立⁸。虽然中国最终未能阻止英国与日本的妥协活动,但中国以坚持抗战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已不再是可以任人随意宰割的羔羊,不会因为他的妥协而放弃持久抗战的决心和勇气。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对美国试图与日本媾和的企图也进行了有力抵制。从1940年11月开始,美日两国的一些非官方人士着手策划议和,1941年4月,这种活动成为两国政府间的非正式会谈。日本希望通过谈判使美国承认其对中国的侵略战果,并减轻乃至取消美国对日的经济压力;而美国试图拆散三国同盟,以免在美德开战时遭到日本进攻,导致两洋作战的困难局面。对于美日间的会谈,中国共产党保持了高度警惕。早在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在《5月25日揭破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指示中就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⁹。8月下旬,美日非正式会谈的消息被泄漏出去,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蒋介石通过其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向美国表示,中国现在感到政治上是孤立的,越来越担心不能受到公正对待。对此,美国表示谈判是非正式的、非官方的,不会损及中国利益。11月,美国国务卿赫尔拟就了一个在经济封锁问题上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的权宜方案,引起中国政府的激烈反对。11月24日,蒋介石致电胡适,要求其向美国严正声明:在日本侵华问题根本解决之前,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¹⁰。在中国强烈反对和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也表示不满的情况下,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

中国积极抵制英美与日本妥协的外交努力是成功的。在英国与日本进行妥协时,美国虽未如中

¹ 秦孝仪主编:《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二),第102-103页。

² 克利福德:《5从中国撤退:1937-1941年的英国远东政策》6,第142页。

³ 吴相湘:《5第二次中日战争史》6下册,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676页。

⁴ 秦孝仪主编:《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二),第377页。

⁵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5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6下卷第二分册,第143-145页。

⁶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5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6下卷第二分册,第138页。

⁷ 5毛泽东选集6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62页。

⁸ 秦孝仪主编:《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一),第149页。

国所愿出面进行干涉,但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支持中国。如英国与日本达成5有田-克莱琪协定6后,为了抵消这一协定对中国抗战产生的消极影响,美国在两天后宣布废止日美商约,这样,六个月以后美国就能不受约束地控制或停止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英国关闭滇缅公路后,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对此感到遗憾和失望⁰,指责此举是/对世界贸易设置不合理的障碍⁰¹。罗斯福则于7月25日宣布航空燃料、润滑油和废钢铁的对日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在英国对日两次大的妥协下,美国都做出了相应的举措表示对中国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美外交的成功。此外,滇缅公路最终只关闭三个月后又重新开放,也表明中国对英国绥靖的坚决抵制是有成效的。就美日妥协而言,中国的强烈反对成为导致美日和谈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的抵制,促使英美两国终于放弃远东绥靖政策,最终成为与中国并肩抗日的盟友。

中国积极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的努力,避免了远东慕尼黑的结局,起到了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走向联合的作用。对中国来说,反对英美与日本的妥协,固然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利益。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决定了它迟早会将整个世界卷入战火之中,任何国家想要通过牺牲别国利益来换取自身安全的企图,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食苦果。中国为抵制对日绥靖政策所进行的有效努力,使英美等国不能无所顾忌地牺牲中国,自然也就不会完全向日本屈服。换言之,中国抵制英美远东绥靖政策的努力保全了中国抗日战场,而中国战场的存在又有力地支援了欧亚各个反法西斯战场,进一步推动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三

如果说在1939年日本占领海南岛以前,中国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更多地是反映了中国人的心理状态而非国际政治的现实⁰,那么,随着日本逐渐显露出南进的企图后,中国要求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则成为对国际政治现实的反映。为谋求英、美、苏等国更多地关注亚洲事务,造成与美、英、苏等国合作抗日的局面,中国作了不懈努力。

日本占领海南岛后,南进的企图已昭然若揭,英、美、法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属地遭受严重威胁。中国政府利用这一时机先后向英、美、法和苏联提出了合作方案,其内容为:(一)中、英、法三国对于远东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俄参预,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敌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之权益。(二)参与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三)在军事方面,中国允许尽量供给兵力人力及物力;其他各国允许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四)在经济方面,参预各国,允许尽量共同维持该各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为推动合作计划的开展,中国外交部还训令驻英、法、美等国大使积极推动各驻在国赞成该项合作方案。但各国对中国的建议都很冷淡,中国政府只好作罢。同年,5有田-克莱琪协定6、5苏德互不侵犯条约6的签订以及英苏关系的恶化,使亚洲的形势更加复杂,中国的处境也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胡适向美国提议,希望美国能出面领导远东问题,为英、苏作中介,使英、美、法、苏能共同一致对日^{1/4}。8月30日,蒋介石又约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申述他对时局的看法,并建议罗斯福发起召集有苏联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远东问题。由于美国拒绝负责联络其他三国,也不愿发起召开国际会议,中国谋求各国合作对日的希望再次落空。

¹ 奎格利:5远东战争,1937-1941年6,第215页。

⁰ 孙友礼:5中国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1931-1941年6(Youli Sun, 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1-1941),纽约1993年版,第7页。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5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6,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5页。

^{1/4} 秦孝仪主编: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一),第86-87页。

1940年9月三国同盟订立后,中国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外交攻势,试图以中、美、英三国结盟来对抗日本。10月14日、31日,蒋介石两次接见英国大使卡尔,讨论了中英两国进行军事合作的事宜¹。18日,蒋介石约见詹森,要求美国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并许诺说,在中美英三国合作中,中国将追随美国²。同年11月9日,蒋介石又分别约见英美驻华大使,面交中美英三国进行经济、军事合作的方案。为推动中美英三国结盟,他还让宋子文、胡适、郭泰祺在美英两国积极活动³。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寻求结盟的外交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毛泽东在11月16日的指示中说:“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⁴然而英美仍然拒绝结盟。11月10日,英国外交部拟定的对蒋介石有关合作方案的答复意见称:中美英三国军事同盟是不可能的,即使英中两国结盟也不可能⁵。罗斯福总统表示,美国不会和日本开战,也不能与他国结盟或作军事上之承诺,对中英同盟,亦不便促成⁶。

寻求结盟抗日尝试的屡屡碰壁,并没有使中国丧失信心。在大国关系、尤其是苏联同英美等国的关系还不甚融洽的时期,为了推动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中国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来调解苏联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英法美等国对苏联是否会加入法西斯阵营充满了怀疑和戒备。当时出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曾为此事多次向英法美的外交人员解释苏联的和平意愿,以消除双方的误会。同样,顾维钧也向苏联驻法代办指出,苏联和英美等国在反击侵略方面有共同利益。驻英大使郭泰祺也作了类似工作⁷。尽管中国居中疏通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但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成立之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无疑都通过各自与中国的关系加深了认识,加强了联系,对后来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能够容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而最终建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中国政府一直倡导的结盟主张提供了实现的契机。战争爆发的当天上午,蒋介石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对日正式宣战。在宣战以前,将中国对于此次战争所采取的政策事先通告美、英、苏各友邦,并征询其态度与主张。会议主张: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要求英、美、苏与中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单独媾和⁸。当天下午,蒋介石又分别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向他们表示:中国决定不避任何牺牲,与各友邦共同作战,以促轴心国家之崩溃,并分别面交建议书,内容包括如下方面:日本在谈判中突袭美国,证明其侵略计划早经预定;中国决心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中国政府决定向日本及其同盟之德、意同时宣战,敦请美国对德、意两国与苏联对日本同时宣战;建议各友邦(中、美、英、苏等)成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军事同盟,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并缔结不单独媾和之条约⁹。同一天,蒋介石还约见了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宣传中国为了与友邦配合作战,正准备对香港、越南及缅甸采取行动。12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建议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

¹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二),第38-42、44-48页。

²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一),第102页。

³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二),第48-52页。

⁴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1939-194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34页。

⁵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6,第393页。

⁶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⁷ 顾维钧回忆录6第四分册(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68、107、471页。

⁸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四册(1937-194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80-781页。

⁹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6第三编(三),第41页。

协调各国作战。12月10日,蒋介石又分别约见美国在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和英国在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尼斯,就联合军事行动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¹。同日,蒋介石电告宋子文,令将该建议直接转达罗斯福,“请其一星期内决定实施办法,否则不成其为作战行动,必被轴心团结一致者各个击破也²”。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发出建立太平洋反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肯定英美抵抗日本是为保卫独立与自由而战的正义战争,并要求党内各级组织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进行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³。中国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美国国务院认为蒋介石的建议“从理论上讲是非常正确的⁴。对召开军事会议一事,罗斯福复电蒋介石表示,“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⁵他建议英、中、荷、苏、美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⁶”。美国对中国建议的这种积极反应或许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一开始,美国政府就把中国看成了抗击日本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国家⁷”。与此同时,丘吉尔也向蒋介石表示,“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⁸对于联合军事会议之提议,丘吉尔也复电赞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密切联系与协商,加快了反法西斯联盟建立的步伐。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反法西斯国家签署了5联合国国家宣言⁹,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建立。

中国是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的国家,由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构成的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长时间地在东方孤军奋战,独自同强大的日本法西斯抗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中国在立足于自身抵抗的同时,积极寻求盟国共同抗日,其愿望之迫切,其行动之积极,也是必然的。中国之所以能在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坚持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持久抗战,始终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高举反法西斯大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必然会排除各种干扰,推动着反法西斯国家走向联合。二是中国的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¹⁰,“是世界性的抗战¹¹”。正因为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中国的民族危亡而战,也是为遭受法西斯侵略与威胁的世界各国而战,中国与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利益的高度一致,决定了中国倡导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必然会富有成效。

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是反侵略国家能够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基石。如果没有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反侵略国家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一定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不仅以持久抗战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反法西斯战场,而且在倡导与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之所以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也是1942年1月1日反法西斯国家发表5联合国国家宣言¹²时,中国成为与美英苏比肩的四大国的重要原因。

[本文作者胡德坤、关培凤,分别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张晓华)

¹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第47、50页。

²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三),第52页。

³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6下卷第二分册,第153-154页。

⁴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6下卷第二分册,第66页。

⁵ 里斯:《击败日本》(David Rees, The Defeat of Japan),韦斯特波特1997年版,第53页。

⁶ 丘吉尔著,韦凡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伟大的同盟》,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98页。

⁷ 5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59-60页。

SUMMARIES OF ARTICLES

China's Status and Rol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ti-fascist Alliance of the World

Hu Dekun Guan Peifeng

The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was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ti-fascist alliance of the world. One of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of China to the anti-fascist war is advocated firstly and promoted actively the creation of the Grand Alliance against the fascist countries. After the breakout of Lugouqiao incident, not only did China strive actively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assistance and support, object to the compromise at the expense of China between the Anglo-American and Japan, but also openly and directly advocated to develop an anti-Japanese alliance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and China. China's all effort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of the Grand Alliance.

The Relations of the Papacy and the Bishops in Perspective: Historical Comments on Canons 375) 411 in the Code of Canon Law of 1983

Peng Xiaoyu

As a branch of church history, the history of canon law always tells the tension between legal ordinances and their ever-chang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The Papacy and the bishops in the local churches formed their relations over a long period under varied social,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conditions. This essay, in delineat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anons 375-411,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pacy and the diocesan bishops, including the traditions from the early church and the medieval chu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tican and the American hierarchy is then cited as a modern model of the communion between the Pope and the local bishops.

Shift of Functions: From Sacramental Priesthood to Preaching Ministry

Liu Cheng

Luther had never denied the office of priesthood, and insisted that certain qualified Christians to be called to exercise the office of the ministry after receiving appropriate training. What Luther did deny is the division between - spiritual estate and - temporal estate, which has made the priests a privileged caste in medieval society.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priesthood, however, had to be changed, and what happens was the major shift from a sacramental priesthood to a preaching ministry in the Protestant Church. For the Anglican Church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shift of functions would depend on how the ministers met the intellectual requirements of preaching.